

不要以为“神器”在手就能呼吸无忧

■评论员观察

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

一些防霾设施既然能被称之为“神器”，一般都经得起仪器检测，防霾的效果毋庸置疑，但是很多人只看到它对空气的净化，却没有看到它对空气的污染。为了营造一个小小的纯净空间，为之付出的代价却是消耗更多的能源，污染更大的空间，这近于饮鸩止渴。

雾霾重来，笼罩齐鲁。近期的空气质量足以证明，雾霾确实是当前的“新常态”。在这个大背景下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雾霾的危害，各种“防霾神器”不断升级，从3M口罩到空气净化器，再到新风系统，很多家庭为了防霾不惜重金投入。

公众争相防霾不是坏事，怕了雾霾往往会更有动力去治理雾霾，但是也要警惕一些人自以为“神器”在手，反而对雾霾的严重性和治霾的严峻性失去了敏锐的感觉。如果我们不能真正从发展理念和生活方式上作根本的改变，而是继续享受高能耗高排放的物质生活，各种名目的“治霾神器”只会使雾霾变得更为严重。

据媒体报道，近来有一种“神奇的”气膜体育馆受到很多人的青睐。这种体育馆设有送风口和排风口，加装了三层空

气过滤系统，能够有效降低馆内空气的PM2.5值。在持续的雾霾天气中，很多学校已经停止了室外教学活动，现在有了这个“神器”，很多人顿时觉得孩子们“有救”了，也盼望当地教育部门尽快出手。

一些防霾设施既然能被称之为“神器”，一般都经得起仪器检测，防霾的效果毋庸置疑，但是很多人只看到它对空气的净化，却没有看到它对空气的污染。仍以当下最走红的气膜体育馆为例，为营造这样一个小小的“世外桃源”，姑且不论建筑耗材是否会加重环境污染，仅维持场馆运转一年耗电费用就需35万元左右，而巨额的电费就意味着巨大的能源消耗。尽管有专家认为，相对于普通建筑，这种体育馆具有节能环保和运营维护费用低的优点，但是不能否

认的是，这种“神器”的普及一定会大大提高每个学生的单位耗能。为了营造一个小小的纯净空间，为之付出的代价却是消耗更多的能源，污染更大的空间，这近于饮鸩止渴。

众所周知，雾霾的形成与能源的使用有着密切关系，其中确有能源结构不合理、能源品质不高的问题，更有单位能耗过高的问题。早在两年前，就有数据证明中国的建筑业消耗了世界四成的钢筋和水泥。这几年，很多人都以购买“改善性住房”的方式扩大了人均住宅面积，却没有意识到窗外的雾霾与自己有什么关系，室内各种电器一应俱全，须臾不离，现在为了防霾又添置了各种耗能的“神器”。

我们为何终日笼罩在雾霾之下？不是气象出了问题，也不是地理出了问题，而是生产和

生活方式出了问题。日前，中国工程院专家指出，中国东部单位国土面积煤炭消耗是世界平均值的12倍，京津冀地区是世界平均值的30倍。再看济南，十年前机动车保有量尚不足100万辆，而现在直逼200万辆。有这样的能源消耗，出现这样的雾霾天气也就不奇怪了。可怕的是，很多人开始迷信防霾技术的神奇，却不及时改变落后的生活方式，甚至在物质主义的生活道路上越走越远，房子面积越来越大，车子排量越来越大。

在雾霾动辄爆表、空气污染持续不退的环境中，增加一些应急设施，帮我们渡过眼前的难关，这无可厚非。但是无论“神器”有多么神奇，我们必须尽快回归低碳环保的生活，不能为了无止境地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而加重环境压力。否则，什么“防霾神器”都救不了我们。

布置“点赞”作业，学校缺少约束也会任性

■一家之言

杨雄

有网友爆料，四川的一所高校给学生布置一项“特殊”的寒假作业，作业的内容是要求学生寒假推广该校的官方公众号，并且要求有“点赞”，对于“点赞”数量还有特定的要求，不能低于100个，否则视为挂科。辅导员证实称，学校确实安排了这项寒假作业，是传达学院的领导指示进行的作业安排。(1月12日人民网)

事实上，在高校当中，像这样的特殊作业还真不少。我所在的学校曾研发出一款APP，在全校推广后饱受诟病，功能单一，使用体验差。学校为增加APP的用户数，给每个班的班长布置了一项任务，要求每个班使用该软件的聊天功能，组建社群，每天每位同学必须在

群里签到，并在班群里发布十条以上的消息，学院会对每个群的活跃程度进行考核，排名靠后的班级将遭到公开批评甚至是取消评优评奖资格。

审视这些特殊作业，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存在着很多共性，背后也藏着一个大问题——一些学校和老师，习惯以挂科、延迟毕业、取消评优等相威胁，给学生布置特殊作业，而其中的一些特殊作业，比如推广公众号的性质更为恶劣。

上述问题，足以折射出一些学校和老师利用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。在权力任性的作用下，不仅是特殊作业，各种限制人权的奇葩校规更是数不胜数，校园越来越成为奇闻轶事的发源地。这样的情况难道就没有办法干预？其实不然，教育部门对前文所提到的所有做法都有相关规定，但令人费解的地方也正在于此，为何在有规定约束的情况下，特殊作业、奇

葩校规依然层出不穷？权力任性缘何久治不愈？

或许，前几日发生在西安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的事情能给出答案。该校学生向当地教育部门举报雾霾天学校不按规定停课，结果，该学生举报信息遭泄露，并被老师“教育”。此事被曝光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，当地教育部门承认了泄露隐私侵权，但涉事的工作人员和学校都只是被通报批评。同样，综观那些侵犯学生权利的奇葩规定，只要学校取消了就行，没有任何人会遭到惩罚。

无论是学校还是老师，在侵犯了学生的正当利益甚至是有违法嫌疑时，受到的处罚不痛不痒，付出的代价太低，校方才会一如既往任性。所以，此事件当中的特殊作业，也应当引起相关部门更深层次的思考，如何才能对侵犯学生权益的行为进行有力、有效的打击，让教育在正常的轨道里行进。

“贩婴案”破了三年，公正公开仍在路上

■公民论坛

于立生

2013年8月，陕西富平县爆出特大贩婴案，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副主任张淑侠被渭南市中院判处死缓。但直到2016年，临渭区民政局才贴出一纸公告，让民众认领三年前追回的21名被拐幼童。1月11日，临渭区民政局回应：公告所称渭南市儿童福利院属市级单位，临渭区民政局从未发布过该公告。(1月12日《北京青年报》)

不论该公告是哪个部门发布的，既然当年追回婴幼儿不下21名，又焉有三年多后才公告认领的道理？当地公安机关要找到这些婴幼儿的父母，本非难事，当年案发后，在派出所登记孩子失踪、涉及张淑侠的家长就有26户之多，哪怕私下里逐一电话回访，也早该把这些孩子送还了。

刻意遮丑“捂盖子”，也让这起特大贩婴案再度面临“究竟涉及多少婴幼儿”的拷问。公告显示21名幼童待认领，而当年12月30日张案庭审，渭南市检察院指控张淑侠拐卖7名婴儿并致死1名，且当时有4名已送还家长。那么，张淑侠拐卖的婴儿就应为26名，恰与家长们的登记信息完全吻合。拐卖26名并致死1名，又岂能只以拐卖7名并致死1名追诉呢？尤其是，致死的1名，庭审还不予认定，这不都是漏罪吗？

据上述公务人员透露，当地官方为“捂盖子”，采取了拆案，统一口径等一系列措施。所谓拆案，即把张淑侠单独提出来审判；无论其4名触犯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的同事，还是其一同贩卖的5名同案犯，都没并案处理，而是“另案处理”了。

一份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到的刑事判决书显示：其4名同事因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，

助产士司欣判处有期徒刑1年；妇产科主任高文平判处有期徒刑1年，缓刑2年；副院长姚军民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，缓刑1年；院长王莉免于刑事处罚。发生26名婴儿被拐卖并致死1名的恶性案件，居然如此高举轻放。而上述判决，是基于被拐卖婴幼儿只认定6名，致死1名不认定，显然，定罪量刑同张淑侠一样，也涉及漏罪。至于张淑侠的5名同案犯又是如何“另案处理”的？目前检索不到任何本应司法公开的相关信息。

此案暴露出的当地相关领导干部以权压法，干预司法活动，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问题。尤其“捂盖子”故意漏罪，涉嫌滥用职权、徇私枉法渎职犯罪的问题，亟须得到彻底查处纠偏，还家长们一个公道，还司法一份公正，还社会公众一个信息公开。

■投稿邮箱：qilupinglun@sina.com

■媒体视点

“有困难找警察”的口号妇孺皆知，并且深入人心，以至于有些人不管大事小事都想找警察帮忙，甚至没事都拨打110聊上几句。这种情况是全国性普遍问题。无效报警占用了宝贵的报警话务和处警警力资源，使真正处于危险境地的群众得不到及时救助。在警力有限的情况下，110亟待减负。

怎样给110减负，却需要慎重对待，因为“无效报警”本身也很复杂，情况多样，应予区别对待。以笔者之见，无效报警大致可分三种类型：一是恶意或骚扰式报警，譬如网络主播申某通过在线直播恶意骚扰温州110；二是各种奇葩报警，譬如孩子不服管教就拨打110，这些报警虽无恶意，但是奇葩无聊；三是群众确有无法解决的困难要寻求帮助，或者确有问题和投诉向相关部门反映，但又不属于警务范围的报警。

对于第一种无效报警，警方应依法予以惩处，这没有问

题。对于第二种无效报警，虽不便给予处罚，但110接线员应对报警人加以劝告，明确不予受理，并及时挂断电话，以节省话务和警力资源。

对于第三种无效报警，虽然不属于110受理范围，即对警方来说是“无效”报警，但对其他职能部门而言却是“有效”投诉，110不应置之不理，而应告知报警人相关部门的投诉电话，或者将问题和投诉转给相关部门处理。

也就是说，对于无效报警要分别对待，不应一概拒之，而是要“堵”也要“疏”，堵住那些恶意或者无聊的报警，疏导那些虽非警务业务但属其他职能部门管辖的问题和投诉。目前无效报警泛滥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反映问题、请求帮助的其他渠道不畅通，有些职能部门的服务不给力，各种公共服务热线几成摆设。给110减负，需要其他职能部门肩负起自身责任，同时打通110与其他公共服务热线的联系，让群众有问题、有困难时不再依赖110。(摘自光明网，作者晏扬)

■一语中的

很多地方官员还是长官意志为主，想去表现，就发布信息，不想表现，就躲在后面，一个是逞能，一个是躲，都不符合法治要求。

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莫于川表示，《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》发布已近一年，但落实情况并不理想，一些党政负责人秉持言多必失的态度，不愿发声。发布文件很可能只是维持阶段性效果，往往在发布之后，第二年就被大家慢慢忘掉了。

官员看开发商吃肉自己想喝汤，这是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因为地方政府已经合法地吃过“肉”了。

在媒体人陶舜看来，“开发商吃肉官员喝汤”背后，除了腐败问题之外，还有经济越来越

多地被房地产绑架的尴尬现实，以及越来越严重的土地财政依赖症。用以满足群众安居的房地产业，已经沦为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吃肉喝汤的源泉。为了满足官员的贪欲，开发商无非少吃几块肉，其他人却只能喝西北风了。

人们在留言区里的胡乱谩骂，并非因为教育程度低，并非因为无法理解，也并非仅仅因为观念不同，而是因为这是恶意见格带来的思考和行为方式。

学者崔娅铭在其专栏中介绍了加拿大心理学家针对“喷子心理学”的最新研究。把网络当做垃圾桶拼命宣泄，其实是一种病态。只有“网络恶霸”能够正确认识网络暴力和人格失调的紧密联系，能够自觉自愿地寻求帮助以及自我克制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网络暴力的问题。